

比较政治学及中国视角

潘 维

什么是“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亦称世界政治),遵循类似自然科学重复实验的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兼用纵向(时间)和横向(地域)比较的方法检验“所有的政治因果假设”。灌输有关“正义”道理的“政治哲学”和“宪法学”曾几乎囊括了政治学的全部。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理阻隔迅速消解、民智大开,学者们接触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机会骤然变得丰富。自此,缺少时空条件比较的价值判断和纯粹思辨逐渐式微。追求对“行为”的“解释”而非描述,即追求“科学性”,成为学科风气。以“为什么”设问,答案必是“因果”的。使用价值中立的“行为”一词、比较其历史的时空条件,创造了政治学的“科学”导向。行为研究让政治“科学”繁荣,原先人文导向的大学“政治系”或“政府系”多改名为“政治(科)学系”(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在自然科学,若因果假设不能被重复实验所验证,就不能称为科学结论。在社会科学,因果关系主要在“行为”比较中确立,以提出“为什么”和出色的“假设”展示学术水准。其实,即便对纯思辨者,催生新知识也依靠比较。逻辑体系依赖概念定义的精准,但“同样”的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的内涵可能不同。内涵不同会导致逻辑体系不同,貌似相同的知识体系在不同语言里就发生变异。

比较政治学并非“显学”,因为比较只是“方法”而非政治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随着政治“科学”的发展,政治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断演化,在西方大学里逐渐形成了以下六个方向:(1)本国政治;(2)比较政治;(3)国际政治;(4)政治哲学;(5)政治科学方法;(6)行政管理。比较方法已在政治学全部六个领域里应用,几乎覆盖了政治学的全部。所以,政治学逐渐不再需要加上“比较”二字,“比较”政治趋于消亡,成为研究“外国政治”的代名词。美国的大学政治系通常有七成以上的教员从事比较政治的教研。“本国”政治于“外国”则是比较政治的一

*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部分。为什么比较政治偏重“外国政治”而不包括“本国政治”？本国政治被政治，而非政治学，赋予了特殊重要性。作为本国所有文理科大学生和中学生的必修课，既要改善对本国政治的理解，又要向本国国民说明本国政府和政体的正当性。然而，不比较外国，关于本国政治的说法在当今的国内人民中缺乏说服力。所以，专修美国政治的美国学人也大多兼修欧洲政治。在全球化时代，分成“本国政治”与“外国政治”来讲述政治道理恐怕难以持久了。比较也是研究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主要方法，比较内政还是解释国际行为的主要方法之一。政治哲学先前强调概念和思辨，弘扬某类价值观，现已演化为结合政治历史比较的“比较政治思想”，解释思想和概念产生的历史时空条件。方法论则集中研究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进行比较。不同的是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完全依赖（案例和数据的）比较，却在脱离政治学成为“管理学”的一部分，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管理学院，如同“商业管理”在脱离经济学、出现独立的商学院。已有不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称“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不过，到目前为止，行政管理还离不开政治学基础知识，商业管理也还离不开经济学基础知识。

比较政治学又是“显学”，因为还有不少政治学人不使用比较方法。若政治学人全部自觉采用比较方法，“比较”政治学就消亡了。不少政治学人还坚持学科的人文导向，不提“为什么”，不采用“比较”方法，不接受因果答案必然引发的争议。他们著述的主旨不是回答“十万个为什么”，而在描述“十万个是什么”。科学导向的论文程式是：疑问、假设、原因、验证——结论可证伪，极富争议。人文导向的论文程式是：领域、意义、阶段、特点——除立场外无可争议。人文导向弘扬价值观，如同历史学，通过描述“是什么”弘扬某种关于政府、政体好或坏的判断。因为如此，《史记》是中国的《圣经》。因为还存在不少人文导向的政治学人，“比较”政治学才成为“显学”，而未成为政治学的全部。人文学科虽不同于社会科学，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社会科学。价值立场让人们知荣辱，辨善恶，晓得甜酸苦辣。类似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政治科学也鲜有被“普遍”接受的因果道理。从根本上说，如同研究者自己，我们研究的对象有感情、有思想、有创造力，未必是“社会因果律”下的傀儡。不仅如此，政治学研究政府权力的来源、过程、结果，政府有极大利益参与并干预这个学科，而且不少政治学人参与支持或反对某类政府。因此，针对政治学研究成果的争议很大。普遍、激烈的争议是政治学/比较政治学魅力的源泉。

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当今的主要问题是流行“制度迷信”。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来执行的，活人能轻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不是“永动机”，不能永葆国家青春，不能让任何国家或任何事物逃出兴衰循环的必然命运。长寿之方是科学，长生不老是迷信。政治制度来自社会，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些判断是“政治科学”存在的基本前提。尽管“顶层设计”之类政治/社会“工程”不断遭遇失败，但冷战后流行的“制度迷信”却长盛不衰。拒绝研究制度的

起源和条件让政治科学出现“反智”趋势,变成宣扬某种制度好或坏的意识形态。美国政治学不流行制度迷信,但制度迷信以美国的名义流行。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任务是从中国视角重构流行的政治知识。当然,若不能汲取世上已有的学问成就,纯粹追求视角的“中国”特性,无异追求狭隘。不少学人希望从“世界视角”,甚至跳出地球,从月亮或太阳上“客观”看人类政治。之所以都做不到,因为学人们脚踩着地球上有限的土地,自身均有所属的地区、国家、历史,在这些环境下成长、生活,还用母语写作,以母语人群为主要读者。迄今流行的政治概念体系和主要结论大多是西方人从自身视角和经验做出的。这些学人鲜有中国经验,不熟悉象形文字,也就不可能有中国视角。他们提出的政治道理在中文世界被大量翻译、不断转述,遂成主流。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因对西学的“硬译”及对西方的仰视,也使中国视角和本土概念在中文世界里被忽略甚至歧视。地方视角有益于世界政治知识的积累。在意大利最南端的西西里岛上,以当地居民的视角看欧洲,与站在德国和法国的角度看欧洲非常不同,也很有趣。因长期在地理、历史、语言上封闭,人口占世界1/5(不久前还曾是1/3、1/4),中国视角和语言表述的独特性弥足珍贵,类似从月亮上看人类政治。比如,西方的政治研究从古至今强调形而上的“制度”,并用参与治理者的人数来区分制度。而中国的政治研究自古至今强调治国之“道”,关心内容而非形式。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视角能在道理、方法、语言、概念上补充世界的政治知识。

如何构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在我个人看来,有三个可操作的方向:第一,以中国为主要视角来理解世界各国,并从“他者”视角来理解本国政治,总之不排除本国政治。第二,依地理区域和人口的“大、中、小”国分类,淡化流行的制度分类法,即“自由民主国家、共产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三个世界”划分。第三,放宽视野,试图诠释当今所有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放弃“典型案例”法。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将能对人类的政治知识做出贡献。